

推开西北解放大门

「钳马打胡」：孙瑾溪 桂星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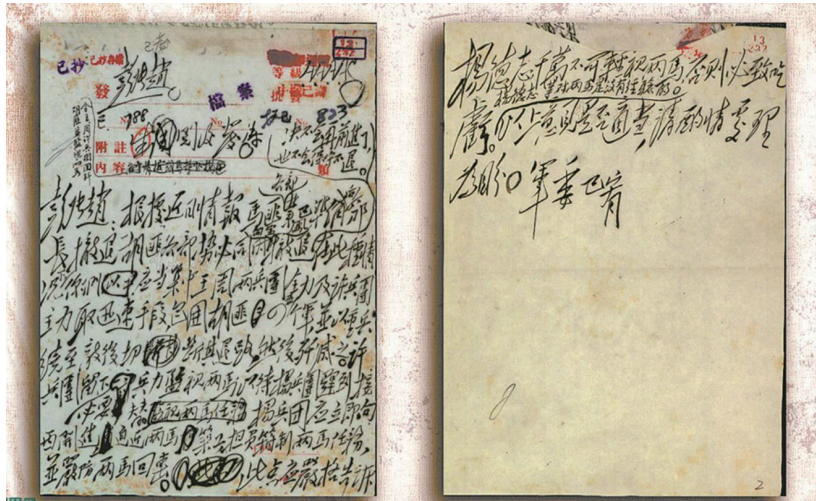
在香山革命纪念馆《毛泽东同志香山时期发布电报手稿专题展览》中，展出了毛泽东在香山时期起草的202封电报手稿。一封封电报，充分展现了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决心。

展览中，有一封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发给第一野战军的电报。电报提出以“钳马打胡，先胡后马”的方式来解决盘踞在西北的两大国民党军残余势力。

电报中的“马”，一个是指长期占据青海和甘肃部分地区的地方军阀马步芳集团；另一个是指长期占据宁夏的地方军阀马鸿逵集团。“两马”以骑兵战法为主，机动作战能力较强。“胡”指的是国民党军胡宗南集团。

在渡江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中央军委在香山向各野战军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宗逊和赵寿山为副司令员的第一野战军奉命向西北进军。第一野战军于1949年5月11日发起陕中战役。5月20日，西安解放。之后，第一野战军继续集结兵力，向西北进军。面对西北地区的两大强敌，远在香山的毛泽东于1949年5月26日致电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指出同时攻打胡部和马部是不可取的，并且不要着急开打，要等待时机。

在我军整顿之时，马继援率兵从北进攻咸阳，企图攻占西安。我军向马继援部打响了咸阳阻击战，取得全面胜利。马继援率兵



第一野战军的电报

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发给

后撤到泾河以西，退守彬县、长武、永寿一带。胡宗南主力5个军也由武功、周至向扶风、眉县撤退，撤至渭河南北两岸地区，另一部撤至更西的宝鸡地区。两方部队呈犄角之势，企图阻止我军继续西进。

6月中下旬，第18兵团（司令员周士第）、第19兵团（司令员杨得志）从太原快速行军，陆续抵达西安，加入第一野战军。第一野战军的军事实力显著增强，与“两马”、胡宗南部决战时机逐渐到来。

在当时的形势下，第一野战军内部就如何“钳马打胡”进行深入讨论。

彭德怀根据毛泽东“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战”的军事思想，考虑先进攻胡宗南部。彭德怀就此想法致电中央。经过深思熟虑，毛泽东于6月20日制定了《钳制马继援等部消灭胡宗南的作战部署》，指出打胡部的同时要钳制马部。6月26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向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致电，明确指出“钳马打胡”的作战方针。

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

根据近日情报，马匪各部业已准备向彬（县）、长（武）撤退，胡匪各部队同时向宝（鸡）、凤（翔）撤退，决不会再前进了，也不会保守不退。在此种情况下，你们应当集中王（震）、周（士第）两兵团全力及许（光达）兵团主力取迅速手段，包围胡匪四五个军，并以重兵绕至敌后，切断其退路，然后歼灭之。许兵团留下必要兵力监视两马，以待杨（得志）兵团赶到接替。杨兵团应立即向西开进，迫近两马筑工，担负钳制两马任务，并严防两马回击。此点应严格告诉杨得志千万不可轻视两马，否则必致吃亏。杨得志等对两马是没有经验的。以上意见是否适当，请酌情处理为盼。

军委
已阅（六月二十六日）

收到电报后，第一野战军在咸阳召开了第七次扩大会议，并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对“钳马打胡，先胡后马”作战方针做了仔细分析与深入讨论。就当时局势分析，“两马”兵力较为分散，且机动灵活，所以进攻较为费力，不能一举歼灭之。而胡宗南则把兵力部署在渭河两岸，导致其部队没有纵深，当大部队被包围时，其他部队无法及时赶来救援。虽然胡部、马部可以相互支援，但实际情况是胡、马联盟有名无实，如果我军围歼胡部，“两马”不会冒险出兵救援。经过权衡利弊，我军决心先攻打胡宗南部。

我军的作战方式正如电文所指，先派出一个兵团迷惑“两马”，钳制其兵力，再由主力迂回包围胡宗南部，并绕至其背后，配合正面部队进攻，让胡部遭受攻击时无法退回宝鸡，即“钳马打胡，先胡后马，两翼伴动，左右包抄”。

在电文中，毛泽东还特别关注了“杨兵团”，即第一野战军第19兵团。为了迷惑敌军，杨兵团在7月10日来到离“两马”不远的乾县、礼泉以北的高地上修筑工事，佯装进攻，使马部不敢轻举妄动。10日晚，我军主力部队急速行军，向敌后迂回而去。这是一次非常大胆的迂回，部队要穿过两敌的接合会防区，相当于深入敌人腹地。同时，担任断敌后路任务的第4军也开始行动。部队一夜行军70余公里，于11日晨提前占领了通向宝鸡必经之地的罗局镇和眉县车站，使胡宗南部无法向西逃窜。

所有准备已经完毕，战斗打响。王震率领的第1兵团，许光达率领的第2兵团，周士第率领的第18兵团向胡宗南部发起猛烈攻击。等胡宗南反应过来时，其主力部队已经被第一野战军从东、北、西面团团围住。11日夜，胡宗南下令国民党第65军、第38军沿着铁路向宝鸡撤退。经过一夜行军，他们到达罗局镇，但这里早已被我军占领，胡宗南命令部队全部突围出去，不得退缩。第一野战军第2兵团第4军毫不畏惧，怀着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展开顽强抵抗，即使伤亡惨重也没有后退，打出了人民解放军的威武气势。

之后，我第2兵团第6军、第4军从敌右侧进攻，我第18兵团第7军向西进攻。在我军的强大围压之下，胡宗南部被围困在扶风西南部，渭河北岸。下午3时，会合的第一野战军发起总攻，先用火炮压制敌人，再从四面缩小包围，穿插攻击。除了南渡渭河逃命的一部外，敌军大部被歼灭。随后，我第1兵团又攻占了眉县以西地区，将南渡渭河的8000余逃兵全部俘获。宝鸡、益门镇也被我军占领，扶眉战役取得全面胜利。

战役中，第4军在7月酷暑中急行120公里，在伤亡众多的情况下，仍然出色完成任务。战役结束时，彭德怀对第一野战军司令部副参谋长王政柱等人讲：“四军这次打得好，这次立了功。”

第一野战军在扶风、眉县地区对国民党军进行的进攻作战，被称作“扶眉战役”。此战，第一野战军歼灭国民党军胡宗南集团3个军和马步芳部1个军共4.4万余人，缴获骡马1500余匹，各种炮180余门，轻重机枪960余挺，解放了陕中广大地区，有效阻断了胡宗南部、“两马”两集团之间的联系，为而后各个歼灭两集团主力创造了有利条件。

历史证明，“钳马打胡”的方针是正确的。远在千里之外的毛泽东，通过电波指挥着瞬息万变的战场，准确预测了胡宗南部、“两马”两集团的动态，提出“钳马打胡”的奇招，展现了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和高超的政治方略。

（摘自2021年10月11日《解放军报》）

青年毛泽东如何练就坚强骨气

□ 周伟东

骨气多指刚强不屈的气概。青年毛泽东主张奋斗，强调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天地人指的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的各种困难，要敢于与困难作斗争。面对困难不畏缩，而且要敢于斗争，这是骨气的体现。骨气的最高境界莫过于敢于和强大的敌人作斗争。

青年毛泽东和强敌斗争的典型事例是猴子石缴枪。1917年11月，一支3000多人的北洋军被湘桂联军打败了，从衡阳溃退到长沙城南，由于不知城内虚实，在猴子石一带徘徊。实际上，当时长沙是一座空城，只有少量地方警察维持治安，没有驻军。猴子石距离一师不到五公里。因此校内人心惶惶，很多人准备收拾东西到山上躲避兵灾。一师学子毛泽东力主依靠学生自愿军歼灭这支溃军。校长孔昭绾认为毛泽东讲得有道理，让他全权指挥这次军事行动。毛泽东带领200多名手无寸铁的学生自愿军，联合地方警察，趁着夜幕把溃军包围在猴子石的山下，又是鸣枪，又是在油桶中大放鞭炮，营造千军万马的声势。同时喊话：“你们被包围了，缴枪不杀！”吓得溃军纷纷缴械投降。一场兵灾，化于无形。时人称赞毛泽东

浑身是胆。这是毛泽东平生指挥的第一次军事行动。

青年毛泽东还参与领导了“驱张运动”。1919年11月，因北洋军阀张敬尧督湘期间祸湘乱湘，而且镇压湖南的五四运动，民愤很大，毛泽东等发起了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他们一面在湖南发动学生罢课、教师罢教、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一面派代表分赴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揭露张敬尧的罪行，争取全国舆论支持。毛泽东是赴京请愿代表团的重要成员，进京开展舆论斗争，组织千余群众示威请愿。他们还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游说分驻衡阳和郴州的吴佩孚和谭延闿驱张。经过半年多斗争，驱张运动取得胜利。通过驱张运动，青年毛泽东已成长为小有名气的政治活动家。

为了鼓舞大家起来斗争，青年毛泽东曾在《湘江评论》上发表文章说“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这是他不畏强权、敢于斗争的写照，正是在与强敌的斗争实践中，青年毛泽东练就了坚强的骨气。

（摘自2021年11月30日《中国组织人事报》，原标题为《青年毛泽东的志气骨气底气》）

来自延安保育院的《丢手绢》

□ 董少东

“丢，丢，丢手绢，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

面，大家不要告诉他，快点快点捉住他，快点快点捉住他……”

这是一段自带“背景音乐”的文字，您看到时是不是也会轻轻哼唱？《丢手绢》，几乎是中国流传最广的儿歌。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这首歌诞生于七十多年前的延安保育院。

1935年至1948年，中共中央、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陕北战斗生活了13个春秋。那时的延安，是烽火硝烟中的革命圣地，澎湃的革命激情之中，也流淌着《丢手绢》这样的童真和欢乐。

这是革命年代延安娃的童年欢乐，延安保育院就是他们成长的摇篮。延安保育院就是当时设在延安的儿童保育院、托儿所的统称。据不完全统计，延安保育院在十余年间养育了5000多名孩子，大多数都成长为建设新中国的栋梁之材。

“天毛毛（蒙蒙）亮，这一长列五十孔石窑洞的大院落，就显得十分喧闹——孩子们醒来了。刚敲过起床钟，阿姨们都赶来给他们穿衣服。当阿姨们接近床边时，她们应接不暇地握着很多的小手——在我们这里，一天的生活是这样开始的。”

保育员鲍倪这样记录第一保育院的清晨，字里行间流露着温暖和欢快。这样“萌化了”的场景，正是保育院的日常。

文章发表在1945年4月4日的《解放日报》上，标题是“一切为了孩子”。从第一保育院到

中央托儿所，到第二保育院，都把这句话奉为誓言、信仰，也真的把这句话变成了每一天的每一件事。

鲍倪就是儿歌《丢手绢》的词作者。她1939年来到延安，先后在抗大和中国女子大学学习。在保育员中，鲍倪文化水平较高，当上了第一保育院的文化教员和保教科长。

丢手绢就是那时孩子们常玩的游戏，但是还没有儿歌，一般是阿姨带着孩子们拍手。能歌善舞的鲍倪就编了几句简明、童真的歌词，伴着节奏唱出来。孩子们一学就会，很快就流传开来。

孩子们的歌声偶然被作曲家关鹤岩听到，甚觉有趣，给《丢手绢》谱了曲，旋律变得更加朗朗上口，从此，《丢手绢》成了几代人的童年记忆。

（摘自2021年11月2日《北京日报》，原标题为《圣地摇篮——烽火硝烟中的延安保育院》）



陈康容（1915—1940），原名月容，又名亚莹，笔名胜子，岐岭霞山村（现下山村）人，1915年出生于缅甸。其父陈锡梅曾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失败后，侨居缅甸经商谋生。1930年，陈康容15岁时，被父亲送回国内接受教育，进入侨领陈嘉庚所创立的集美中学读书，在学校接受了先进思想的洗礼。

1935年，高中毕业后，陈康容随父亲回到缅甸曼德勒，在当地小学从事教书育人活动，并积极参加当地华侨爱国救亡运动。1936年，在国内反日斗争高涨之时，陈康容再度回国，进入厦门大学读书，其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领导厦门的宣传抗日救亡运动。

陈康容是一位美丽的女性，同时又是一位才女、诗人。她能歌善舞，善于利用歌声和自编的戏剧节目向群众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她文笔犀利，写出了许多为争取妇女地位及抗日救国的热门文章。

在厦门大学期间，陈康容参加抗日歌咏宣传队，深入民众、妇女之中，教他们唱歌，讲解歌词意义，借歌咏队进行抗日救亡宣传。

据1985年9月出版的《厦门妇运史资料》署名为“克里”的回忆文章称：陈亚莹（康容原名）认为抗日救亡运动并不只是男子的份，女人也是匹夫有责的。在厦门抗日歌咏队里，她与队员李英深入到群众中以歌曲宣讲东北沦亡下民众悲惨的故事，号召民众：“抗战要大家一条心，要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前线……”

陈康容爱好诗歌，曾与好友陈鹭岛以及著名进步诗人蒲风、童晴岚一起组成了“中国诗歌会厦门分会”，并出任总务，随后出版《厦

“金丰大山红杜鹃”——纪念陈康容烈士牺牲81周年

□ 付华顺

门诗歌》创刊号。在当时《江声报》编辑谢怀青眼中：陈康容不仅是个诗人、爱国救亡者、革命者，还是厦门妇女运动的先驱。他在1984年《深切悼念陈亚莹同志》一文中回顾了在厦门与陈康容一起战斗过的峥嵘岁月。

1937年初，正值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革命诗人蒲风来到厦门，先后组织了6次诗歌座谈会，随后刘良骥从上海来到厦门，大家教唱抗日救亡歌曲，高唱“不做亡国奴”，并发动各界妇女参加歌唱，宣传抗日。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她中止学业，不顾安全，拒绝了父亲安排其回缅甸过舒适生活，全心投入抗日救亡运动。陈亚莹根据地地下党“厦门工委”的指示，先后加入中国妇女慰劳前方抗战将士总会厦门分会、厦门文化界抗战后援会、厦门各界抗战后援会慰劳工作团。在党组织的指示下，担任了厦门各界抗战后援会慰劳工作团宣传股长，并利用它的公开组织形式，发动各界妇女宣传抗战。

随后，与黄楚云、王筱光、谢怀青等成立了党的妇女支部，并担任执行委员。她带领厦门各界抗战后援会的热血青年和妇女走上街头，教唱抗日歌曲，进行抗日救亡演讲，演出

抗日救亡戏剧，深入社会办妇女夜校，激励群众起来参加抗日救亡斗争。

她经常上街宣传爱国思想，教群众唱抗战救国的歌曲。遇有敌机轰炸，她就去救护伤员、慰问灾民。她还到厦门妇女夜校鼓励夜校学生加入抗战救国的行列中。此外，她还以“胜子”为笔名，在《星光日报》副刊“星星”“实艺”栏目及《江声报》《晨光报》上发表抗日救国的文章。

1937年9月26日，陈康容在福建省抗战后援会厦门分会宣传部《抗敌导报》创刊号上发表了《厦门妇女怒吼起来了》一文，高度肯定了妇女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作用与重要性，认为唤醒被忘记的妇女们是建立妇女救亡工作的重要基础。

自1937年11月至牺牲前，陈康容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回到龙岩白土镇参加第一期抗日救亡干部训练班，并随后回到家乡永定岐岭地区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据1986年《永定党通讯》第一期所刊陈康容丈夫黄康（原名黄会斋）的访谈文章介绍：

1937年11月，厦门大学党组织派遣陈康容随当时闽西南特委第二书记谢育才到龙岩白土

镇参加中共闽粤赣边省委举办的第一期抗日救亡干部训练班学习，其间她与当时的闽西南特委宣传部副部长黄会斋同志相爱并结婚。

1938年5月，陈康容受党组织指派，回到她的老家永定县岐岭乡开展工作。经中共岐岭支部书记陈荣松介绍，担任支部宣传委员，以岐岭下山村培文馆小学教员身份公开活动。从此，陈康容以培文馆为阵地，建立了岐岭青年抗敌同志会和岐岭抗战后援会；创办了妇女学校，成立了宣传队，自编抗日宣传歌曲，开展了蓬勃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9年后，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反共摩擦，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闽西南，国民党制造事端，破坏永定地下党组织，搜捕共产党员，迫害党员家属和抗日人士。陈康容同志正是在这白色恐怖背景下被国民党顽固派逮捕而牺牲的。

厦门市委党史办主任胡冠中在《归侨女英烈陈康容》一文中，用文学的手法对陈康容被捕后坚贞不屈、英勇就义的过程作过细致的描写：

1938年底，陈康容生完孩子从梅县回到岐岭，永定的斗争形势越来越险峻。1939年，中

共岐岭支部书记陈荣松共产党员身份暴露，不得不撤入金丰大山进行游击斗争。岐岭党组织的工作就落到支部宣传委员陈康容身上。随着国共两党的斗争愈来愈尖锐，为了保证陈康容的安全，上级通知她上山避一避风头，但陈康容难以割舍刚出生的孩子。1940年8月18日晚，陈康容被捕，保安团害怕陈康容被游击队劫走，连夜把她押解到20公里外的抚市（今龙岩市永定区抚市镇）看管。

在监狱中，敌人软硬兼施，百般折磨，要她说出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情况，陈康容严词拒绝，最后还在自白书上写道：“青春价无比，团聚何须提。为了伸正义，岂惧剥重皮！”表现出了为了正义与革命，不惧牺牲的大无畏精神。

1940年9月17日，陈康容被福建省保安团残酷地杀害于抚市的山墩上。临刑前，她还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汉奸卖国贼！”壮烈就义时年仅25岁。陈康容英勇就义后，闽粤边区成立了“康容支队”，以纪念这位坚强不屈的女战士。

陈康容用自己的行动，以无比的忠诚对待党及革命事业，谱写了一曲英雄的赞歌；用25个短暂而绚丽的年华，铺就了伟大而光辉的一生，被当地人亲切地誉为“金丰大山红杜鹃”。

（摘自2021年11月2日《福建日报》）

